

坚持国家的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国伍良編著

財政經濟出版社

坚持国家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国伍良 编著

*

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总布胡同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80 号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787×1092 1/32 · 2 1/4 印張 · 50,000 字

1958 年 4 月第 1 版

1958 年 4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100 定价: (7) 0.22 元

統一書号: 4005.385 58.3. 京型

寫在前面

我們編写这本小册子有三个理由。第一、在这次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时候，曾經对国家粮食統購統銷政策大肆污蔑，我們感到有必要用鉄的事实来粉碎資产階級右派的进攻，保衛社会主义的經濟制度。第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特别是农業合作化以后，粮食战綫上發生了一些新的情况，一方面从根本上講，給粮食分配工作創造了許多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也發生了某些新的問題，有些老的問題也以新的形式表現出来。粮食工作的任务在于：正确認識合作化以后的新情况，充分利用各方面的有利条件，認真解决粮食分配上存在的問題。在这方面，国家的政策虽則仍然是坚持粮食統購統銷，但是方針和办法上有了新的發展，这本小册子就是試圖对国家粮食統購統銷政策的新發展做一些說明。第三、由于对右派分子的謬論辨別不清，或者由于对合作化以后的新情况認識不足，或者由于其他原因，有些人对統購統銷政策發生怀疑和动摇，有些人对粮食局勢有盲目乐观情緒，还有些人存在着忽視国家利益的偏向。对于这些問題，各地正在通过社会主义大辯論来明辨是非，以保証国家粮食統購統銷的順利进行。这种大辯論今后可能每年进行一次。这里只是从粮食方面提供一些材料供大家参考。

因为我們的認識水平較低，这本小册子可能有闡述不够甚至錯誤的地方，希望讀者指正。

目 录

一、粮食統購統銷的历史回顧及其偉大成就·····	3
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农業合作化以后的新情况 和新問題·····	16
三、搞好粮食分配必須实行統筹兼顧、适当安排的方針·····	26
四、瞻前顧后、相互支援、以丰补歉·····	32
五、坚持粮食定产、定購、定銷政策·····	38
六、进一步做好市鎮粮食供应工作·····	49
七、关闭国家領導下的粮食市場·····	56
八、粮食工作是一項重要的政治工作·····	64

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粮食是一項最重要的物資，只有保證滿足了各方面必不可少的粮食需要，整个市場物价才能穩定，国家建設才能順利进行，工农联盟才能进一步巩固。但是，目前我国的粮食情况是不够富裕的，要保證滿足各方面必不可少的需要，除了必須大量增产粮食以外，还必须認真做好粮食的分配工作。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我国的粮食分配工作，必須有計劃按比例地进行，必須从六亿人口出發統籌兼顧、全面安排。目前我国实行的粮食統購統銷，实际上是国家对于粮食的計劃分配，所以它是国家的一項重大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現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經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設將會进一步發展，粮食分配工作的重要性將更加突出，我們完全有必要繼續深入研究我国的粮食統購統銷政策。

一、粮食統購統銷的历史回顧及其偉大成就

1953年冬季实行粮食統購統銷以来，我們在粮食战綫上已經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几年来的历史完全証明，实行粮食統購統銷是保證我国胜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的重要条件，是保證我国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根本政策。可是資产階級右派分子却抓住我們具体工作上的某些缺点，利用粮食战綫上的某些困难，在那里歪曲事实、顛倒黑白，大肆叫囂“統購統銷搞糟了”，說什麼“人民处在飢餓和死亡的邊緣”，向人民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展开了猖狂的惡毒的

進攻，企圖從根本上否定國家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在我國實行資本主義復辟。但是，人民特別是廣大勞動人民是最公正的，他們經過自己的親身體驗，得出的結論恰恰同右派分子相反。他們認為糧食統購統銷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認為實行糧食統購統銷不是使人民處在飢餓和死亡的邊緣，而是使人民生活更加有了保障，人民可以更加安定地進行勞動生產。這就是為什麼當廣州市的右派分子羅翼群在統購統銷問題上到農村大肆放火的時候，農民要把這個敗類裝在麻袋里送回廣州的基本原因；就是為什麼農民要不斷跑到反動分子葛佩琦那里展開面對面鬥爭；廣大農民要向反動地主代表彭一湖展開莊嚴聲討的基本原因。

為了打垮右派分子的進攻，正確認識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我們認為回顧一下解放以來我國糧食問題的历史，重溫一下糧食統購統銷的偉大成就，是完全必要的。

大家可以回憶一下，在1949年全國解放的時候，我們剛剛接管全國的城市，剛剛建立了全國性的人民政權，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投機家們，曾經利用舊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製造了几次大規模的市場風潮。他們通過市場的波動和物價的上漲，從經濟上向我們展開了一場猖狂的進攻，企圖進而從政治上逼迫我們就範。那個時候他們進攻的主要方法，是把游資用來突擊兩白（大米、花紗布）一黑（煤炭）這些最關國計民生的主要物資，而且以兩白尤其是以糧食做為主要的突擊對象。所以在1950年3月以前，曾經製造了三次全國性的物價上漲和市場波動，而其中有兩次是糧食帶頭的。

當時這種情況嚴重地威脅着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威脅着人民生活的穩定和改善，並且威脅着人民政權的鞏固和發展。事情非常明顯，或者我們能夠把市場物價穩定下來，那

么就能够保证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能够保证人民政权的稳定和巩固；或者我们听任资产阶级投机家们在市场上继续兴风作浪，那么就根本谈不上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更谈不上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新生的人民政权也就不能巩固和壮大。

党和政府深刻地认识到当时的市场斗争带有决定国家命运的性质，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能不能发展的第一个关口。因此，在1949年最后一次全国性物价大上涨以后，国家便从各方面做了充分的部署和准备，同资产阶级投机家们展开了一场严重的市场斗争。这次市场斗争，以粮食作为斗争的中心，整个国家财政金融全力支持，纱布市场和其它物资供应也做了有力的配合。结果粉碎性地打击了资本主义的投机活动，终于在1950年3月把全国的市场物价基本上稳定下来，根本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以来13年物价不断狂涨的历史。并且为以后的边稳（稳定物价），边打（抗美援朝），边建（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良好的条件，也就是保证了以后党和政府“边稳，边打，边建”方针的实现。

从这一次严重的市场斗争和粮食斗争中，完全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自由泛滥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是极大的。比如，国家根据当时的情况估计社会游资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带，尤其是宁、沪、杭三角地带，而上海又是游资的大本营，因为三次的市场物价大波动，有两次是从宁沪杭地带开始，以致由南向北引起了全国波动的局面。可是这个地带有多少游资呢？当时估计用几亿斤粮食来吸收社会游资，就可以把市场物价稳定下来，而实际结果在1950年3月把市场物价稳定下来的时候，国家在市场上使用的粮食力量比这个数字小的多。可见当时的社会游资是很少的。

为什么这点游資能够几次造成市場物价的大波动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投机家的投机倒把和資本主义的自由泛滥。投机奸商在市場兴風作浪，必然引起人民心理紧张，人民心理越是紧张，投机倒把越有广阔活动的余地，市場情况也就越發紧张，所以小量的社会游資就足以引起大量的市場物价波动。第二，是因为人民長期遭受着市場波动的浩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后直到解放这一年，13年来市場物价都是处于不断狂漲的局面，而粮食又是市場物价波动的核心。所以这些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一上漲，就会引起人民心理的全面紧张，因此也就很容易在全国范围引起市場物价的波动。总之一句話，市場物价的波动是資本主义自由市場的特征，是資產阶级投机家們投机倒把的惡果。

我們再来看看 1953 年冬季实行粮食統購統銷以前的情况。在 1950 年的时候，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措施，有力地限制資本主义的自由活动，有效地稳定了市場物价，从而使我国国民經济的恢复和發展获得了稳定的基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我們对关系国計民生的重大物資还不能实现計划分配的办法。所以当国民經济經過一个恢复时期以后，当国民經济有所發展和人民購買力有了相当提高以后，購買力同物資供应的矛盾就显露得更加明显了。在这种情况下，投机奸商又再度在市場上，特别是在农村的市場上掀起了投机倒把的風浪，在局部地区造成了市場物价的波动。而粮食仍然是市場爭夺的中心。

大家知道，在 1953 年的时候，由于我国土地改革的完成和国民經济的恢复和發展，人民購買力已經有了普遍提高。而在国家开始进入有計划的經济建設的时候，一方面因为国家增加了大量的建設投資，人民的購買力更加提高起来；另一

方面,国家进入建設时期以后,农業生产增長的速度,又比恢复时期有了一些下降。因此,从1953年春季以后,粮食供应同購買力之間的矛盾,生产和需要之間的矛盾就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

那时候,投机奸商因为看到有机可乘,便利用資本主义自由市場,大肆兴風作浪,向社会主义經濟展开了全面的进攻。同时投机奸商还和富农勾結起来,利用一切机会同国家爭夺粮源,同国家爭夺农民(主要是富裕中农)。他們企圖利用这个机会推翻和打破社会主义制度所給予資本主义的限制,同国家爭夺农村的經濟障地和政治障地。于是在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就展开了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展开了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兩条道路的斗争。

那时候,一方面投机奸商和其他資本主义分子利用市場供求失調的机会,利用农民資本主义自發趋势相当严重的有利条件,提高粮价进行搶購,并且还用买青苗、放高利貸的办法杀价收購貧雇农的粮食,控制粮源,制造供不应求,煽起群众的緊張心理,造成粮价波动,从而进行非法的投机和超額剝削。当时有些地方一戶投机奸商竟然囤积几十万斤粮食,严重地影响了国家对于粮源的掌握。往往在一个地方因为奸商进行了几十万斤粮食的投机活动,就要影响到国家几百万以至几千万斤的粮源。另一方面,农民在經過几个好年成以后,生活有了改善,他們不急于出售余粮,加以奸商兴風作浪,他們便滋長着一种严重的資本主义自發傾向,在农村曾經弥漫了一种囤粮投机和剝削的風气。当时大約有占农民总数60%左右的农民存有不同数量的余粮,不少地区的农村开始了新的階級分化。这样不但严重地影响了农業社会主义改造,而且也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粮食的收購。

由于这些情况的存在和发展，所以在 1953 年春季，若干省份遇到了一些春霜灾害以后，便引起了粮价大幅度的上涨，而到了 1953 年秋季新粮上市以后，粮食紧张情况就在全中国范围内发展起来，形成了国家粮食购销严重脱节的局面。这样就使粮食产需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地区之间、季节之间和品种之间的不平衡状况更加明显和尖锐。于是在国家进入建设时期的第一年，就面临着新的严重的粮食困难。

当时的情况说明，如果允许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继续存在和泛滥，它将在极大程度上加剧生产同需要之间、物资供应同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国家粮食购销脱节的严重情况将会继续发展，并且将会在第二年春天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粮食价格的波动。而粮价是整个市场物价的中心，粮价的上涨，必定牵动整个市场物价的上涨，结果就要打乱整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部署。

党和政府也像解放初期一样，及时地分析和认清了当时粮食问题的实质。一方面，看出了粮食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指出了在粮食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主要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利用生产同需要的矛盾在市场上兴风作浪。另一方面，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指出我国的粮食是够吃够用的，而且只要调度得当、分配合理，只要将现有的粮食资源充分利用，还会有所积余。也就是说，虽然生产赶不上需要的发展，虽然物资供应同购买力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只要对现有粮食进行最有效、最合理的分配，这种产需之间、供求之间的矛盾是可以不断得到调节的。

党和政府充分估计了当时的形势以后，便决定从 1953 年 11 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取缔资本主义的粮食自由市场，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来进行粮食的分配，以计

划分配的方式代替資本主义的自由購銷。

几年来的历史完全証明，实行粮食統購統銷不但使市場物价得到了进一步的稳定，保証了社会主义建設的順利进行，而且也为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極為有利的条件。現在，我們在回顧了粮食市場和粮食統購統銷的發展历史以后，就可以把資本主义的自由購銷同社会主义的計劃分配来具体对照一下，讓事实証明粮食統購統銷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

第一、几年来的事实証明，由于实行粮食統購統銷，使国家有效地掌握了粮食資源，保証了各方面必不可少的需要。使国家有条件对于粮食分配实行統筹兼顧、适当安排，从而保証了社会主义建設的順利进行。

如前所述，在实行粮食統購統銷以前，由于私商經營的粮食大約占上市量的 30—40% 左右，他們同富农勾結起来，总是千方百計地煽起市場的緊張，实行囤积居奇，圖謀暴利，他們根本不能維護农民的正当利益和保証居民的粮食供应，并且直接影响了富裕农民，使富裕农民惜售待漲的心理和資本主义自發傾向更加發展，他們掌握着大批粮食不肯出售給国家。因此，只要一有風吹草动，粮食市場和价格就迅速波动起来。比如 1953 年春季河南等省遇到的霜灾并不算严重，但是由于奸商、富农的兴風作浪，自由市場根本没有粮食上市，都紛紛向国家粮食机构搶購粮食，結果国家的粮食銷量一下子就增加了几倍，有的地方甚至增加几十倍，粮食价格也一下子上漲了百分之几十。当时国家要随时調动大批粮食去应付發生問題地方的市場供应，处于顧此失彼和随时可能被突击的危險境地。可是实行粮食統購統銷以后的情况怎样呢？那就大不相同了。国家把粮源基本上掌握了起来，迅速扭轉了收支逆差的局面。这样就統筹保証了各方面必不可少的供应，

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設的物質基础。

所謂国家保證了各方面的糧食供应，归納起来是兩個基本方面。一个基本方面是保證了农村的供应。它包括几千万人口的农村缺粮戶，每年都有的几千万灾区人民，几千万經濟作物区农民，一兩千万的漁民、鹽民、林民、牧民、船民和其他农村非农业人口。这些人中間，有少数是需要供应一年的糧食，多数需要供应几个月或一兩個月的糧食。很明显，如果不能保證这些方面的需要，要使得农业經濟以至整个国民經济全面地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是不可能的。另一个基本方面是保證了將近1亿人口的城市和工矿区的糧食供应。也很明显，如果不能保證这些城市工矿区的需要，根本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設。总起来講，在我国的情况下，这两个基本方面，那一方面的糧食供应不能保證，就不可能有今天国民經济的全面和迅速的發展。所以我們說，国家能够在糧食分配上实行統筹兼顧、适当安排，对于保證社会主义建設的順利进行，保證工农生产的不断發展，保證工农联盟的巩固和發展有着严重的意义。

第二、要特別提到，实行糧食統購統銷的結果，保證我国人民順利地渡过了兩次大灾荒。

大家知道，在自由市場的情况下，要平安渡过1954和1956年兩次大灾荒是决不可能的。在反动統治时期發生了灾荒，投机奸商和地主富农就会勾結起来兴風作浪，趁火打劫，粮价一下漲一兩倍，甚至一日数漲是很平常的事情。即是如此，也不可能充分的糧食保證供应。大批灾民因而飢餓死亡，广大灾民陷于傾家蕩产、流离失所、卖兒卖女的悲慘境地，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往往一年受灾，农业生产要几年才能恢复。比如民国17—19年（即1928—1930年）的西北大灾荒，仅陝西

一省逃荒的人数就有 200 万人左右，占全省人口总数的 1/6，而且逃荒的人大多是有劳动力的人。当时陕西省服务委员会在 37 个县的调查，被贩卖的妇女竟达 30 多万人。这就说明，反动统治和自由市场根本不管灾民的粮食供应，它是依靠死亡来解决问题的。

与此相反，解放以后国家领导农民生产救灾，拨出大量的救济款和粮食保证灾民的生活和生产，因而不但基本上消除了饿死人的现象，而且使灾区的生产能力得到迅速恢复。但是应该指出，在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前，由于自由市场仍然存在，所以发生灾荒的时候，还往往会引起市场粮价的波动，使广大农民在经济上仍然遭到很大损失。比如 1949 年有些地区受灾以后和 1953 年春季几个省分遭灾以后，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只有在统购统销实行以后，才使灾区最后摆脱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危害。使我们安全渡过了两次大灾荒。第一次大灾荒发生在 1954 年，安徽、河北、江苏、河南、湖北、山东等许多省分遇到百年少遇的大水灾。全国受灾田地有 1 亿 8 千多万亩，受灾人口 6 千多万人。国家这一年全国范围内调度了 1 百多亿斤粮食源源运往灾区，用来保证所有灾民的粮食供应，并且派出许多飞机和大量船隻给被洪水围困的灾民运送熟食。不但保证了灾区人民必需的粮食供应，使灾区的生产能力迅速得到恢复，而且灾区的粮食始终保持一个价格，那些想投机取巧的人根本无法制造市场混乱。所以农民群众感激地说：真是百年未有的大水灾，千年未有的好政府。他们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称之为“救命政策”。

1956 年我国又遭到了第二次更大的自然灾害，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这次灾害仍然安全渡过。这年全国受灾田地 2 亿 3 千万亩，受灾人口约 7 千万人。国家在灾区比上年度少购

和多銷 160 多亿斤粮食。仅以河北省为例，国家从 24 个省市中調运 36 亿斤粮食支援河北灾区的人民。这些粮食都是余粮地区用人力、畜力或用汽車集中到交通沿綫，再用輪船、火車运到河北灾区。这些粮食如果用人力担，每人担 60 斤，就需要 6 千万人担；如果用載重 3 吨的卡車接运，需要 60 万輛；如果再用火車接运，需要 6 万个車箱。由于支援了大量的粮食，灾区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充满信心地投入緊張的生产自救，解放前那种受灾之后悲惨悽涼的景象沒有了，而且晚間还可以听到庄园上傳来坚毅的歌声。象这样全国性的粮食大調运，在我国历史上还是一个創举。过去有“百里不販草，千里不运粮”的說法，历代統治者更是不願意在运粮上賠錢。难道除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誰能够做出这样为人民兴利除弊的惊心动魄的好事嗎？同时，象这样的大灾荒还能够保証灾区人民安全渡过，而且粮价根本沒有上漲，这难道不实行粮食統購統銷而依靠資本主义自由市場可以办到嗎？难道国家不在粮食分配方面实行以丰补歉的方針可以过去嗎？所以我們說，正是兩次严重的灾荒攷驗了党和政府統購統銷政策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第三、实行粮食統購統銷的結果，完成了私营粮食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商業陣地，从而保証或者促进了整个私营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这样就在一个主要方面消除了市場不穩的因素，保証了市場物价的进一步穩定，加固了社会主义建設的基础。

物价穩定，是我們大家最关心的事情。如果物价不穩，人民首先是工人的生活就会受到严重威胁，农民也会受到殘酷的剝削。而历史告訴我們，正是資本主义的自由氾濫，是市場物价不穩的主要病根。解放前那种物价不穩給人們帶來的苦

难日子，大家是记忆犹新的。比如北京市电车公司有一位电车司机，在回忆起 1946 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粮价飞涨的情形的时候，还是那么痛恨，他说：“那时一發薪赶紧拿着口袋满街寻粮食，不是寻不着，就是买不起。有时弄到一斤米，煮一大锅稀粥，喝的时候一个米粒跟一个米粒跑。没有办法，我经常下了班一头就睡到第二天，上班时饿得头晕眼花。”沈阳市机器厂一位技术员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那时粮价上涨，国民党和大私商们都很喜欢，米价越涨他们越发财。就在他们发财的时候，我爸爸吃不下豆饼饿死了，不久，我的已滿 2 周岁的孩子也活活的饿死了。”在那种情况下，农民当然也免不了悲惨的命运。比如：江苏省江宁县东山镇的农民，回忆在国民党时代物价不稳的情形说：“物价不稳农民吃的亏数不清。”过去物价一日三变，商店里都贴着一张条子：“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麦子登场时 3 斗麦子买 1 斗米，有一年 5 斗麦子买 1 斗米，等到下半年买麦种籽的时候，又要 3 斗米买 1 斗麦子。安徽省怀远县五岔社一农民说：“解放前的世界不象个世界，粮价一天涨几回。有一次我到蚌埠卖了 2 担麦子，回到家只隔了一天，卖的錢就只值 2 斗粮食的錢了，没过几天 2 担粮食的錢只能买 2 打洋火、1 斤洋油了。解放后要不是統購統銷，粮价那能有这样稳当，我看統購統銷对那个人都有好处。”总之农民贱卖贵买、吃尽了物价波动和奸商剝削之苦。他们得出的結論是：“奸商是嘴里喊哥哥，怀里掏傢伙。”“奸商是不种苗田吃大米，不养花蚕穿好衣。”正是道出了剝削阶级靠投机剝削发财的嘴臉。

解放以后由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場的氾濫，也曾几次制造了市場粮价的波动，給人民带来了很大的損失。但是实行粮食統購統銷以后，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国家取締了自由市場，

改造了大批的糧商糧販，整個糧食分配工作掌握到國家手上。這樣資本主義既然沒有了障地，在市場鬥爭上也就顯得無能為力了。所以儘管實行統購統銷以後市場上貨幣流通量比解放初期大好多倍，比實行統購統銷前夜也大，可是却再也沒有出現那時候曾經出現過的市場糧價的波動。這與統購統銷政策的實行是分不開的。這也充分說明了統購統銷的實行鞏固了國家的貨幣信用，而貨幣信用的鞏固又保證了統購統銷的順利進行和糧食價格的穩定。如果以 21 個大小城市 5 種主食成品糧（大米、面粉、小米、玉米面、高粱米）的零售價格平均計算，1956 年 12 月的糧食銷售價格僅為 1950 年 3 月糧食銷售價格的 93.73%，也就是說 1956 年糧食銷售價格與 1950 年比較，不但沒有提高，反而下降了一些。目前的糧食價格還是保持着 1956 年的水平。幾年來由於市場物價繼續保持了穩定，所以才有可能使人民的生活不斷的得到改善，使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能夠順利地進行。許多產品提前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生產指標，也是同物價穩定的有利條件不可分離的。總之，市場物價的穩定，始終是社會主義建設賴以順利進行的必不可少的重大條件。而右派分子反對統購統銷，正是為了使社會主義建設垮台。

第四、實行糧食統購統銷的結果，社會主義便把整個糧食流通分配的環節完全控制了，也就割斷了城市和鄉村資本主義之間的聯繫，大大限制了農村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發展，從而提高了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和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並且鞏固了工農聯盟。

在實行糧食統購統銷以前，城市同鄉村的資本主義的聯繫，雖然受到了各方面的限制，但是他們仍然保持着相互的姻緣，特別是集鎮資本主義和農村資本主義的勾結仍然是千絲

万縷。他們在統購統銷前夜相互勾結，興風作浪，製造市場糧食的波動，直接影響到農民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發展。那時候，在農民中間相當普遍地瀰漫着一種所謂“馬無夜草不肥，農不兼商不富”和“買田不如放債，放債不如囤糧”的投機剝削思想。只要糧食市場稍有波動，在一夜之間就可以有成千上萬的農民變成糧食小商小販。在農民中囤積糧食，買賣土地，雇工放債，搞投機商業等等的投機剝削行為，形成了一股風氣。因而它集中的表現在不少地方的農村開始了階級分化的現象，這是土改以後的新情況。比如江蘇省六合縣南圩區，全區賣地者1951年有3戶，1952年有37戶，而到了1953年1—10月竟發展到280戶。河南省許昌縣在1953年受到春霜災害以後，半年內農民一共買賣土地34,000多亩，大約有3,400戶、17,000多人遭到破產的境地。其他各省幾乎都有這種情況發生。很明顯，如果允許資本主義在農村中氾濫，農村階級分化就不能停止，農業合作化運動就不可能順利地發展，農村也就不可能完成第二個革命——組織起來、改變農業所有制，農民也就不能取得第二次經濟上的解放。

實行糧食統購統銷以後，國家取締了糧食自由市場，從經濟上割斷了資本主義工商業同農民的聯繫，大大限制了農村資本主義和自發勢力的發展，堵死了農民發展資本主義的去路和要道，並且從糧食分配方面開始把小農經濟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同時，國家對農民還進行了深刻而廣泛的社會主義教育，批判了資本主義自發傾向，提高了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因而為農業合作化的發展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比如1953年，由於國家實行了統購統銷，由於黨和政府在全國範圍內派出和訓練了成千萬的幹部和積極分子，在農村中進行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總任務的宣傳，全國約有80%左右的農民